

木犁 *Fei Wo Yu Wo*

书

系

▲——王铭铭学术自选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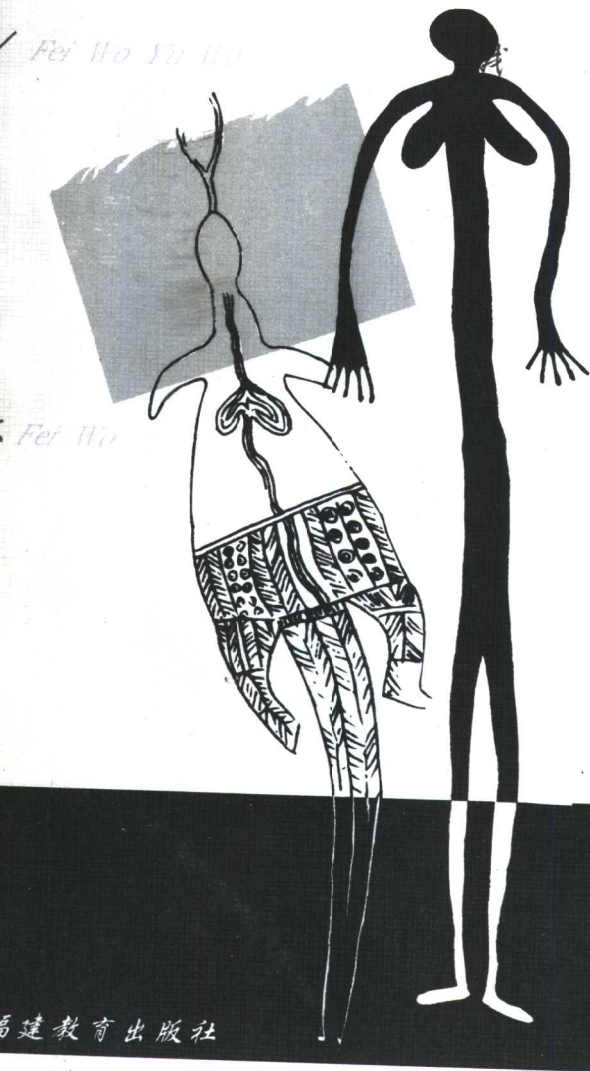
思

丝

非我与我

【木犁书系 / 我思文丛】

王铭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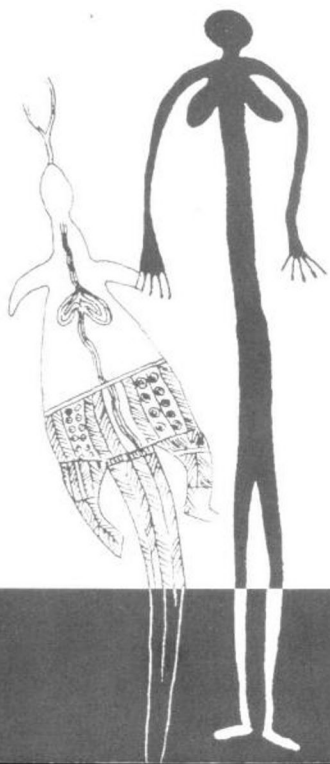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木犁书系 / 我思文丛】

▲——王铭铭学术自选集▼

非我与我

王铭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我与我：王铭铭学术自选集/王铭铭著. —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3
(木犁书系·我思文丛)
ISBN 7-5334-2983-4

I. 非… II. 王… III. 学术-自选-文集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7681 号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 旭

我思文丛

非我与我

——王铭铭学术自选集

作 者 王铭铭

丛书责编 黄 旭 孙汉生

本册责编 沈 群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0001)

印 刷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 365001)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11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300

书 号 ISBN 7-5334-2983-4/Z·63

定 价 27.9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藪，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程，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叶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阙国虬 黄旭

1999年

目 录

1	自序
5	社会人类学 ——从启蒙到反思
57	人类学世界观的一致与分化
107	文化的意义世界 ——“格尔兹文化论丛”译序
127	象征人类学两家评
151	萨林斯及其西方认识论反思 ——《甜蜜的悲哀》代译序
179	文化与普遍性解释 ——别的讲演之后的讲演
199	“文化遗存”的启蒙 ——读两篇西方人类学的有关文章
228	文明与共同体 ——书评两篇

237	西方的东方 ——读萨伊德《东方学》
258	汉学人类学的范式危机
299	汉语人类学 ——西学本土化与学术困境
384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史诗 ——民间文化研究与多元史观的 建构
423	民间文化散论三篇

自序

《非我与我》这部集子是应“我思文丛”编者之约编成的。

为了反映我在 90 年代展开的对于社会人类学学科的思考，本书依据论题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两篇论文，论述的是西方社会人类学在 20 世纪的状况，这一论述试图说明一门以研究西方的“非我”（即非西方）为己任的学科如何具有它的思想意义及如何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分化为不同类型。第二部分六篇评论，集中于人类学的文化论，尤其偏重从解释论、象征论与普遍主义的矛盾来体现文化论缘起的文明史背景，从而追求从述评的角度，展示人类学对于“非我”的研究与文化（或文明）意义上之“我”构成相关性的过程。第三部

分从学术表述的文化困境出发，探讨西方借以“把握”东方的工具之实质，亦探讨非西方文明（以汉语世界为例）在吸纳西方学术体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最后一部分的两篇（实际上包括四篇）文章，则从中国民间文化的人类学研究方面入手，论述文明内部的“非我”（即知识界以外的民间文化）对于知识反思的意义。

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向来追求以“非我”来论述“我”，以他者的文化来洞察本己的文化。总体而言，我于90年代展开的探讨指出了这种文化论的局限性，特别是指出了这种文化论与“世界文化格局”的微妙关系。但与此同时，身处一个在近代以来即以本土主义为特征的文明体系当中，我也感到，尽管在“冷战”以后反思西方世界观对于确立非西方本土社会科学有着莫大的深刻意义，但这种反思不应意味着对于一门学科的历史否定。其实，在一个非西方的文明中，天下的失去常使我们同时失去了对于天下观的意义之洞见，这进而使我们失去了以他人的眼光来洞察自身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人类学提供了那种对于非我（异）文化（other cultures）的洞见，实在是一个欲求保持自身尊严的古老文明所需要的角度，至少这个文化观察的角度使我们更为清晰地看到自身文明体系的问题，而一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这一文化的自觉所开拓的视野又是我们在一个小小的寰球中达成文化的“美美与共”目标所需要的基本意识。

我的研究的起点，在时间上其实可以回溯到80年代，但在研究中获得的心得，则主要是在90年代发表出来的。到目前为止，我在国内发表的论著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即在理论层面上展开的对于西方人类学思想及原著的研究；

其二，即在经验层面上展开的对于汉人社区的民族志考察。本书收录的文章集中于前一个方面，虽在最后一部分简略涉及经验研究的资料，但总体而言属于理论探讨的散论。这些散论大多是发表过的：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中，前一篇的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我所著《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后一篇将为本人所著《社会人类学》教材之一章（将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第二部分关于格尔兹的文章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格尔兹文化论丛”的序言，关于萨林斯的文章为北京三联书店即出之《甜蜜的悲哀》的序言，关于文化与普遍性解释的讲演稿，曾于1998年夏天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作为“国际学术讲演系列”的总结报告宣读，接着于该年底应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之约在“学术论坛”上作为讲座出现，后收入《当代艺术与人文科学》一书（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象征人类学的文章，也曾发表于《想象的异邦》一书中，关于文明和共同体的书评则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之《书评周刊》上，另“文化遗存的启蒙”一文为未刊稿；第三部分三篇论文之第一篇发表于《中国书评》（1996年），第二篇发表于《世界汉学》（1998年创刊号），第三篇即将收入一部学术史论文集；第四部分的前一篇论文曾于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作为讲稿讲授，后收入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化讲演集》一书（广西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大部分内容亦曾作为附录发表于本人所著的《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一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余三篇民间文化散论均发表于《读书》杂志。

社会人类学是我个人爱好的事业。而在近年的探讨中，我也受益于鼓励学科建设的国家教育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及研究生院课程建设基金、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支持。在个人学术历程中，除了我的老师以外，所在单位和学界的一些友人也给予我诸多帮助和启发。对于支持、帮助和启发过我的机构和个人，我虽不能在这里提供一个完整的名录，但却应当对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读者，有两点是需要说明的。首先，由于这些文章是在不同时期写出来的，因此在观点方面可能存在着差异。这一事实只能说明本书收入的文章不是什么定论，而毋宁是对我近年学术思考过程中出现的不成熟看法的记录。另外，由于文章发表与不同的书籍和杂志上，因此他们的行文和注释方式都有所不同。这是一部集子而非专著，因而我就不拟对观点、行文和注释方式进行统一，而倾向于将文章的本来面目呈现在读者面前。倘若这有何不当之处，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王铭铭

1999 年 3 月 30 日

社会人类学

——从启蒙到反思

一、何为社会人类学？

任何一位社会人类学研究者，都可能被问到“社会人类学是什么”这样一个乍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对于提出问题者，我们有时通过概括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来介绍这个学科，有时以这个学科的学派变动来论述它的品质，有时需要指出它与其他诸多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差异，而在更通常的情况下，则容易感到这个问题令人不知如何给予概括的解答。毫不奇怪地，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者，都可能因面对类似的问题而飘忽于诸如此类的窘境之间。尤其是到

非暴力
·
社会人类学

了20世纪的末期,或者简单地说,在近代学科经历了上百
年震荡之后,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言说任何一门科学学科的品质,
确实并非易事,何况我们这里所面对的,正是一门在学术之林中
定位过多地依赖于不断自我反思的学科。

从学科的一般分类考察,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可以说是人类学(anthropology)的一种类型。“人类学”这个名称来自希腊文的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指的即为“研究人的科学”。然而,“人类学”这个学科名称时常令人们感到难以接受,因为所有的近代“科学”——包括人文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对人的问题都有兴趣:一般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存在的基质与方式以及两者的糅合形态,自然科学探索人的认识对象或所谓的“客体”及其与人的关联,而仅就人文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而论,人或主体的问题,向来是学者们探讨的主要对象。^①那么,被称为“人的科学”的人类学到底有何自身的特别之处呢?我们这里所指的“人类学”虽说直到目前为止依然为许多学者所坚持,但是其所隐含的,其实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及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发展出来的理解人类的一种方式。抽象地说,人类学既不是所有学科的综合,也不是哲学式的主体论,而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知识传统。人类学这个名称,最早在16世纪时出现,原来仅指对人体特征的测量与分析,其发

① 例如,社会学探讨人的社会性与社群交往模式;心理学探讨人的内在动力与行为的环境;历史学追溯人类生活状态的变化线路;经济学把人视为追求自我利益实现的行动者来研究;政治学将人当成权力的索求者,并在此权力观的架构下分析制度与个人的关系。

生显然与16世纪以后西方科学和人的观念体系的兴起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

16世纪之后，西方思想界逐步展出一套基于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展现出来的世俗性知识，这一知识的追求试图以“科学”（science）的态度来重新理解世界和人的存在，从而在超越中世纪神学时空局限的无限领域中营造普遍适用的自然法则（Wallerstein 1997）。对于人体进行物理学式的、而非精神的神学“测量”，是那个时代知识世俗化和普遍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作为系统学科的人类学是在19世纪才成立的，因而16~18世纪之间的那段光阴，无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逐步孕育人类学精神的“人类学史前史”。人类学的兴起，首要的条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观对于欧洲的社会思想体系的逐步浸染。对于这样一个自然科学观的浸染，我们现在用“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这个概念来概括，而这样的概括对于人类学的起源之认识而言，确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启蒙运动的主要源头分布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苏格兰，这三个源头自有三种不同的启蒙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家集中研究法与国家的精神，苏格兰学者关注经济发展与社会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德国学者偏向研究民种学研究（Volkerkunde）（Wolker 1993；Vermeulen and Roldan eds. 1995）。但是，身处不同文化传统的启蒙哲学家们却对于“人类学”这个概念情有独钟。启蒙哲学家那里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即为人类学的直接前身，而尽管不同流派的启蒙哲学家对于人类学也有着不同的界定，但他们也共同享有一个划时代的论点，即：人类是从自然界脱胎出来的、从历史中生成和发展的具有理性

(reason) 的物种，而不是由上帝的造物。

19 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知识世俗化和普遍化运动的影响得以拓宽，“科学”这个概念获得了唯我独尊的地位。作为一种新的知识范畴，“科学”不仅得到了清晰的界定，而且与哲学、人文思想、伦理学等领域区分开来，形成了独立的研究和思考方式。“科学”的自主化成长，促使大学的制度在 18 世纪的欧洲得到的振兴；而随着大学制度的振兴，知识的学科化、专业化和去神学化也成为了永久性的制度。与在这个大学振兴和“科学”学科化的过程同时展开的，是许多欧洲国家——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中此起彼伏的急剧社会变革。18~19 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巩固与竞争，迫使社会中的思考者采取与传统神学不同的社会态度。为了推动作为民族—国家主权和公民权的合法化进程，学者们试图以世俗化的知识来重新解释社会组织和人的本性，受 16 世纪以后产生的“科学”的影响，他们主张，若要加剧社会的变革，就务必以现实而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人，而研究人与研究自然的办法应当采用一致的标准，这个一致的标准衍生于把西方思想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天体力学，它的两个关键词是“进步”（progress）和“发现”（discovery），其综合意义即知识对于宇宙自发演化的趋近。作为经典意义上的人类学，即产生于这种务实的社会变革态度之中。

19 世纪的人类学间接地从自然科学的宇宙观中获得了“进步”和“发现”的科学原则，把由人组成的世界解释为科学知识可以发现和验证的“社会物理现象”（social physics）。更直接的人类学从模拟天体演化论而发展起来的

生物进化论中获得了滋养，主张生物界与宇宙一样是“进步”的产物，而作为生物界组成部分的人类，是生物界本身“进步”的产物。于是，以拟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人的生物学和社会进步，成为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主题。受生物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者描绘出了用综合生物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进化论来研究人类的跨学科蓝图，主张既要研究人的体质发生、发展、演变以及变异，又研究人的创造物——文化和社会——与人的本质的关系。这样，19世纪的人类学就成为一个包括研究人的生物层面的性质或生物人类学（physical/biological anthropology）和研究人的文化面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超级学科”，文化方面的人类学研究还广泛包括了研究古代人文类型的考古学（archaeology）、研究使人有别于动物的语言的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以及研究存在于当代世界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当然，尽管人类学试图体现当时科学知识体系“认识世界”的雄心，但这个学科的兴起更直接地与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得到制度化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体系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经过整个18世纪的发展，追随自然科学原则路线的社会科学到了19世纪上半叶已经确立了知识上的内部专门化。不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发生于19世纪后半期。在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研究集中于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及美国，其大部分成果也发表于这几个区域。近代的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欧美的这几个核心地带确立起来。前四门学科集中研究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状。近代型的历史学虽然不

乏它的世界史成分，但其注意力过于集中放在上述几个国家的资料的发现和过程的解释上，其研究一直被认为对于这些民族—国家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有着重大的贡献。与研究欧洲过去的时代的历史学相配合，19世纪下半叶独立起来的社会学提倡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科学观，从原来隶属于社会改革团体的言论体系独立出来，在大学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经济学的产生可能与16~18世纪欧洲各国内部管理所用的法理学、财政学及统计学有渊源关系，但到19世纪才正式以科学的普遍化假设面对现实，从国家管理研究中独立成为一个社会科学学科。19世纪的政治学研究现代国家及其政治，这个学科的确立直接支持经济学地位的巩固，它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强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确立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操作模式。正如试图历史地反思社会科学制度的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所言，“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在19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成为大学里的一些学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对它们的研究主要局限在作为它们共同起源的那五个国家（即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及美国），不仅如此，它们也主要是对那五个国家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华勒斯坦等1998：21）

人类学于同一时期在欧美五个核心国家中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得以成立。但是，与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不同，人类学的所有分科的分析素材均来自于非西方的种族、人文资料和族群生活，而对于西方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面貌兴趣不大。事实上，人类学研究的是16世纪以后欧洲与世界其他民族相遇时所看到的非西方民